

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

姜 守 诚

提 要：王醮仪式是明清以降闽台地区十分盛行的一种宗教民俗活动，其含义就是将代表瘟疫和灾厄的瘟神（王爷）迎请来祭祀礼遇一番后，再将其连同交通工具“王船”一起送离出境，故世人又称为“送王船”。推究此仪式之渊源，当与古老的龙舟竞渡及“厉祭”传统有着直接关联，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习俗则可视为其雏形。明清闽台方志文献中大量涉及了有关“出海”、“王醮”的内容，借助这些史料可大致梳理出王醮仪式的缘起、沿革及流布等情况，并对闽台二地的差异及特点展开比较和分析。

姜守诚，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闽台地区 王醮仪式 请相出海 贡王 王爷信仰

王醮仪式是明清以来盛行于闽台地区的一种宗教民俗活动。王醮实为“瘟醮”，世人避忌“瘟”字不雅而隐称“王醮”或“王船醮”、“王爷醮”、“迎王祭”等。推究此仪式之渊源，当与古老的龙舟竞渡及“厉祭”传统有着直接关联，而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习俗则可视为其雏形^①。王醮仪式多由特定庙宇主持下定期举行，通常以焚送王船（“送王”）为全部活动的高潮和结束。醮典期间，当地民众不论身份地位均踊跃参与、捐献财物，并全程充当义工、扮演各种角色（职司），场面极为隆重，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下面，我们结合明清文献对闽台王醮仪式之缘起、沿革及其流布情况加以探讨。

一、闽地文献中“出海”习俗

晚明以降，王醮仪式（“送王船”）开始盛行于闽台地区。翻检闽台文献，笔者寻觅到的最早史料是明末清初海外散人^②撰《榕城纪闻》。该书介绍了明崇祯十五年福州民众设醮禳祭五瘟帝及“请相”、“出海”的情形：“二月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雉。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

寝，皆仿人生礼。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笏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贴、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装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雉，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围。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蹶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③这段文字对研究和了解闽台地区王醮仪式之起源和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将其含义逐句分析如下：

第一，这场“设醮大雉”显然是针对突发性瘟疫而举行的，并非后世常见的惯例性庆典活动。禳祭的主神是五帝，乃系不入官方祀典之列的土神之类，亦当代表了瘟疫之根源。醮事活动所需的经费由各社居民摊派或捐款筹集而来，换言之，此为民间自发组织的公益性群体（社区）活动。迄今，台湾瘟醮祭典仍以地区性公庙为中

心，由庙方人员牵头组织和操办，同时接受社会人士的自愿捐助（财物及人力），辖区民众广泛参与、充当义工，充分体现出了区域性、公益性、自发性等特征。今台湾王醮所祀主神虽亦系瘟王，却因地域或庙宇的传统不同而计见有五瘟王（五府千岁）、十二瘟王和三十六瘟王等说法。不过，每届王醮仪式通常会从上述瘟王中按照一定原则推选出三位轮值瘟王爷，迎请至“王府”供奉，待醮事结束后，焚船“送王”离境。此外，台湾部分庙宇也有王醮时供祀五位瘟王（或称“五府千岁”）的传统，如台南县安定乡苏厝村真护宫和屏东县东港镇东隆宫即是如此。

第二，民众奉祀五帝的规格和方式，也经历了由简朴到奢华的转变。最初仅迎请五帝时摆席宴客，进而发展到为其专设衙署、配置随从。期间，辖区民众可至衙署投词状、讼冤情，五帝也一如人间的官僚大员，体恤民情，批驳文书、处理公务。世人侍奉五帝之礼仪，完全仿照生人（王公大臣）的居处作息：跟班衙役（由信众充任）每天早晚两次列队恭候五帝坐堂处理公务，一日奉进三次膳食（早、中、晚餐），依时为其换衣、服侍就寝。今南台湾地区设醮期间必为值年瘟王专设“王府”（或称“代天巡狩府”），并挑选若干民众充任差役和内侍，昼夜轮流执勤，一日奉进三餐，按时服侍更衣就寝。轮值瘟王每天早晚两次坐堂办公，收投词状，批驳文书。醮事最后一天，主办方通常惯例于“王府”内大摆宴席“筵王”，并择临近空地（或庙埕）“办桌”排宴、款待乡民和信众。

第三，供奉期间，辖区各社原祀诸路土神均择期前来参谒五帝。这些神祇出巡时均配有仪仗车舆，携印绶文书随行，沿途庙宇彼此参拜、联络友情。到达五帝衙署后，需先到中军帐前递上拜贴、静候召见，并在辕门外“走轿”。一些出身市井职业卑微之人及游手好闲之徒，或脸涂粉彩成鬼状，或扮作差役，跟随神轿，沿路巡行，迎神赛会，相互炫耀、彼此斗奇。今台湾地区凡有建醮，附近庙宇均会由执事人带领下，抬着神轿（内设神像）前来拜谒、联络友情（名为联络神祇，实为加强地方庙宇间感情），当地人称之为“交谊”。且凡神轿出巡，均会见“八家将”和“宋江阵”伴随左右，热闹非凡。每位“八家将”成员皆涂粉彩、勾描成鬼脸状，手持各种奇形怪状之兵器或法器，并遵循特定步伐（进攻时

走“七星步”，围捕时摆“八卦阵”和“踏四门”）编队行进。

第四，继而造作纸船，做工十分精致，船上的器物用品一应俱全，动工开凿及出舱下水等均择良辰吉日，就如同打造真船一般。打造完毕的纸船出舱下水，又名曰“出海”。“出海”的含义是指五帝驱逐瘟疫离境出海而去。这天，社区民众群集而至，杀羊宰猪备足供品，面向纸船予以祭拜。民众以百十人分为一群，每群各执锣和鼓不断敲打，通常凡计有锣鼓数十面（即指与事群众数千人）。他们在执事人的带领下，或摇旗呐喊，或扶舟而行，充当开路先锋，声势浩大，动人心魄。其实，“出海”即类同于今闽台地区常见之“送王船”仪式。今见“王船”多为木质结构，制作精美、宛若真船，船上器物全系真品。“王船”的开凿及下水亦需择日，挑选良辰吉日，并掷筊请示神祇后才得以确定。焚送“王船”那天，民众闻讯扶老携幼云集而来，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异常。“王船”上堆满了民众供奉的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和大捆金纸。出发前，执事率众在演法道士引导下，朝向“王船”先行祭拜——供桌上摆放生猪（全）、生羊（全）若干及其它供品。随后，民众采用肩拉、手推等传统方式将“王船”拖行至焚烧地（多为海滩或流水处），锣鼓声及呐喊声响彻天际，沿路围观群众多达数千人。

第五，或又增设一雉——五帝及部曲随从（均系纸糊），五帝乘坐驿骑车马，旋绕都市四周以示巡行，数千信众执香随从于后，均全神贯注而又毕恭毕敬地站立在烈日中，此谓之“请相”。待到“出海”时，民众争先恐后，即使累得挥汗如雨或途中遭遇了什么意外伤害，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今台南地区曾文溪流域建醮期间必择一位重量级人物代表王爷千岁巡境，其称谓因庙宇不同而存见差别——常见计有“旗牌官”（如西港乡庆安宫）、“辕门官”（如安定乡真护宫）或“巡按官”（如安定乡长兴宫），其装扮均身着清式官袍、朝靴，头戴官帽、顶插花翎，胸披绶带、怀抱王令，每日分两次（上午和下午）在胥吏的簇拥下、骑高头大马巡境游行，检视完毕后必返“王府”向王爷回禀奏报。有些庙宇还在“王府”旁为其专设处所——或称“辕门衙”（如真护宫）、“巡按衙”（如长兴宫）。

第六，上述祭祀活动待某乡刚结束，另一乡

又接踵开始了，甚至不乏三、四个乡，六、七个乡，同时设醮之情况。整个福州地区，从二月到八月、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在此起彼伏地举行类似活动，几乎变成了鬼国。今台湾南部以“送王船”而闻名的几个宫观通常以三年为期（值逢丑、辰、未、戌年或子、卯、午、酉年）例行王醮仪式，且大多遵循既定月份——例如台南地区曾文溪沿线各庙“送王船”时间依次为：苏厝真护宫和长兴宫均为农历三月、西港庆安宫为农历四月。屏东县东港溪流域的东隆宫则为农历九月，小琉球三隆宫“迎王祭典”早年与东隆宫合并举行，现今改为延后单独举行。澎湖马公北甲北辰宫为农历四、五月。

如果说，前引《榕城纪闻》中设醮祭祀瘟王而“请相”、“出海”之举动尚属于应对“疫起”（突发性瘟疫）的临时性举措，至清代则俨然成为了一种惯例行为（习俗）。据道光年间郭柏苍、刘永松纂辑《乌石山志》卷4《祠庙》“五通行祠”条云：“闽中乡社多奉五帝。五六月间，昼夜喧呼，奉神出游，有所谓‘请相出海’。官以其事近于雩，故或禁或不禁。”^⑩此外，道光、咸丰时人施鸿保撰《闽杂记》卷7“出海”条^⑪、道光十九年修纂《厦门志》卷15《风俗记》^⑫、光绪末年泉州名士吴增撰《泉俗激刺篇·贡王》^⑬中记载了福州、漳州、厦门等地乡民每年五、六月间惯例式举行“请相出海”之类的送瘟祭典，藉此印证了清中后期“出海”（王醮）仪式在闽地的盛行。

二、台湾志书中“王醮”仪式

有关台湾“王醮”仪式的最早记载，始见于清康熙五十五年陈梦林纂修《诸罗县志》。该书卷8《风俗·杂俗》云：“敛金造船，器用币帛服食悉备；召巫设坛，名曰王醮。三岁一举，以送瘟王。醮毕，盛席演戏，执事俨恪跟进酒食；既毕，乃送船入水，顺流扬帆以去。或泊其岸，则其乡多厉，必更禳之。相传昔有荷兰人夜遇船于海洋，疑为贼艘，举炮攻击，往来闪烁；至天明，望见满船皆纸糊神像，众大骇；不数日，疫死过半。近年有舆船而焚诸水次者，代木以竹，五采纸褙而饰之。每一醮动数百金，少亦中人数倍之产；虽穷乡僻壤，莫敢愆者。”^⑭诸罗乃初设台湾府时三县之一，辖区相当于今台湾中、北部地区。耐人寻味的是，而今台湾“送王船”习俗

主要流行于南部地区（含金门、澎湖等离岛），中北部则已不多见了。

尔后，康熙五十九年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台湾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杂俗”条云：“台尚王醮，三年一举，取送瘟之义也。附郭乡村皆然。境内之人，鸠金造船，设瘟王三座，纸为之。延道士设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总以末日盛设筵席演戏，名曰请王；进酒上菜，择一人晓事者，跪而致之。酒毕，将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财宝，无一不具。十余年以前，船皆制造，风篷、桅、舵毕备。醮毕，送至大海，然后驾小船回来。近年易木以竹，用纸制成，物用皆同。醮毕，抬至水涯焚焉。凡设一醮，动费数百金，即至省者亦近百焉；真为无益之费也。沿习既久，禁止实难；节费省用，是在贤有司加之意焉耳。相传昔年有王船一只放至海中，与荷兰舟相遇，炮火矢石，攻击一夜；比及天明，见满船人众悉系纸装成。荷兰大怖，死者甚多。”^⑮

又，康熙六十一年黄叔璥撰《赤嵌笔谈》卷2《祠庙》：“三年王船备物建醮，志言之矣。及问所祀何王？相传唐时三十六进士为张天师用法冤死，上帝敕令五人巡游天下，三年一更，即五瘟神；饮馔器具悉为五分。外悬池府大王灯一盏，云伪郑陈永华临危前数日，有人持柬借宅，永华盛筵以待，称为池大人，池呼陈为角宿大人，揖让酬对如大宾；永华亡，土人以为神，故并祀焉。”^⑯

上述三条史料均撰作于清代康熙晚期，虽然彼此传抄痕迹明显，却也递进式增补了不少有价值的细节和信息。兹略作归纳和分析如下：

第一，至迟康熙年间，台湾岛内（无论地处中北部的诸罗县，还是南部的台南县）开始盛行颇具规模的王醮祭祀活动，且沿习既久、深入人心。建醮期间，合境民众筹集资金打造“王船”，置备器用、币帛、服食等，耗费巨大，少则近百金、多则数百金。十余年前（以康熙五十九年为标准），“王船”均系木质造作而成，篷、桅、舵等一应俱全。醮毕，相关人员送“王船”入海后驾小船返回（即今“游地河”）。至康熙五十九年前后，“王船”改为竹质、外糊以彩纸，其它物品则沿循旧制，待醮事结束后抬至水边焚烧（即今“游天河”）。

第二，每三年例行举醮一次，延请道士

(巫)设坛,演法二昼夜或三昼夜。醮典最后一天必大摆宴席、演戏娱乐,名曰“请王”(即今所见之“筵王”):择通晓礼仪者为执事,恭敬服侍、跪进酒菜,请王享用。宴毕,将纸质瘟王送置“王船”上,相应器物一应俱全。最后送“王船”入海、任其漂流而去。若有停靠,沿岸村落必重新迎请禳祭之,否则会被认为将招来灾疫。故而就出现了若一村建醮“送王”,河畔诸村就会接踵跟进的情形。

第三,曾传言说,昔日荷兰军舰在海上夜遇

一艘“王船”,不明就理开炮轰击。待天明登船查看,只见满船人物均系纸扎而成,荷兰人大惑不解、惊恐万分,后死者甚多。

继上述康熙朝史料之后,历代台湾文献亦屡论及王醮仪式,虽陈陈相因者居多(以援引陈文达《台湾县志》为主),却也不乏增补新意者。这些地方志书分别从不同地域及角度对当地情况做了一些补充说明,对全面了解台湾各县及金门、澎湖等离岛的王醮传播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此,我们特予列表如下:

表 1: 台湾方志文献中所见王醮资料举要

序号	编撰人	书名及卷次	成书年代	备注
1.	高拱乾	《台湾府志》卷 9《外志·灾祥》	康熙三十四年 (公元 1695 年)	仅见“天行使者”字样,未详论王醮
2.	陈梦林	《诸罗县志》卷 8《风俗·杂俗》	康熙五十五年 (公元 1716 年)	
3.	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	《台湾县志》卷 1《舆地志·风俗》	康熙五十九年 (公元 1720 年)	
4.	黄叔璥	《赤嵌笔谈》卷 2《祠庙》	康熙六十一年 (公元 1722 年)	
5.	刘良璧	《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 6《风俗》	乾隆六年 (公元 1741 年)	引《台湾县志》
6.	范咸	《重修台湾府志》卷 13《风俗(一)·习尚》	乾隆十一年 (公元 1746 年)	引《台湾县志》
7.	王必昌	《重修台湾县志》卷 6《祠宇志》、卷 12《风土志》	乾隆十七年 (公元 1752 年)	
8.	余文仪主持编修	《续修台湾府志》卷 13《风俗一》	乾隆二十五年 (公元 1760 年)	引《台湾县志》
9.	王瑛曾	《重修凤山县志》卷 3《风土志·风俗》	乾隆二十九年 (公元 1764 年)	引《台湾县志》,又有增补
10.	朱景英	《海东札记》卷 3《记气习》	乾隆三十七年 (公元 1772 年)	
11.	李元春辑成	《台湾志略》卷 1《胜迹》	嘉庆时	采订郡县旧志及前人著述而成
12.	孙尔准等修、陈寿祺纂(程祖洛等辑修、魏敬中重纂)	《福建通志台湾府》卷 19《风俗·台湾府》	道光九年(公元 1829 年)修纂 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重纂	引《台湾县志》
13.	丁绍仪	《东瀛识略》卷 3《习尚》	道光二十七年 (公元 1857 年)	
14.	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	《金门志》卷 15《风俗记·杂俗》	道光及同治年间	
15.	林豪	《澎湖厅志》卷 9《风尚》	光绪十九年 (公元 1893 年)	
16.	佚名	《安平县杂记》	疑出日据初时	计有五条史料

三、闽台王醮仪式的比较分析

试将闽台二地文献中有关“出海”、“王醮”内容加以比对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台湾“王醮”仪式显然是承袭了福建沿海一带“出海”习俗发展而来的,推究其因当系因为清廷收复台湾后,随着福建移民迁台的不断增多,一并把闽地风俗带到了台湾。无论福建的“出海”、还是台湾的“王醮”,其核心宗旨都是借助一系列仪式活动送走瘟船和瘟王,藉此象征驱逐灾疫出境,祈求阖境平安、五谷丰登。当然,二者存在的某些细微差异也耐人寻味。

第一,建醮的周期:每年与三年

晚明《榕城纪闻》所载设醮祭五瘟帝乃系临时性举措,而道光年间《乌石山志》、《闽杂记》则谈到每年五、六月间例行“请相出海”,由此可见闽地送瘟之醮的周期多为一年^⑩。清代台湾文献谈论“王醮”时大多指出“三岁一举”。这是否因为移民迁台后生活艰难、物资匮乏,而“王醮”则耗费巨大,建醮周期由一年延扩为三年,或系基于财力和民力考虑下的变通之举。当然,我们说“三岁一举”虽为台湾民众设醮之通例,但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论。日据初《安平县杂记》就介绍了清末安平县“王醮”例行周期的几种情况,如该书“风俗现况”条云:“近海庄民有王爷醮,十二年一次,用木制王船襁醮三日,送船出海,任风飘流。”又云:“六月,白龙庵送船。每年由五瘟王爷择日开堂,为万民进香。三天后,王船出海(纸制王船)。”最后,该书“风俗义举附考”条对当地的王醮习俗加以总结说:“又有建醮请王,飧祀极其丰盛。或一庄一会,或数十庄一会;有一年举行一次者,有三、五年举行一次者,有十二年举行一次者,择吉日而行之,为费不少。”^⑪事实上,今日台湾地区王醮科仪虽以三年为期者居多,却不乏可见每年一举或十二年一举之情况,如金门等地就盛行年例性“贡王”仪式。

第二,送瘟的称谓:“出海”与“王醮”、“贡王”与“迎王”

前引闽地文献介绍福州等地风俗时多将这种送瘟习俗称作“出海”或“请相出海”。“王醮”和“王船”之称谓,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似始见于康熙年间台湾文献中——如《诸罗县

志》、《台湾县志》、《赤嵌笔谈》。此后,乾隆二十七年刊本《海澄县志》卷15《风土》虽见“造王船之说”、却并未明言“王醮”^⑫,直至道光十九年修纂《厦门志》卷15《风俗记》才见有“王醮”之称谓。当然,这已不能排除受台湾俚语影响之可能。

前引光绪年间《泉俗激刺篇》中谈到泉州乡民称“送王船”习俗为“贡王”,迄今金门等地仍旧沿用了这一称谓。此外,屏东县东港和小琉球一带则将称为“迎王”。总之,“王醮”称谓虽因时代及地域而略存差异,然其送王船之做法及流程却大抵相同。

第三,送瘟的方式:“浮海”与“火化”

至于送瘟的方式,《榕城纪闻》谈到送船出海、任其漂流而去,《闽杂记》则云抬船“至海边焚化”,道光版《厦门志》兼有二者——“造木舟,用真器浮海,任其所之;或火化暴天物也。”台湾文献《诸罗县志》、《台湾县志》则介绍说:十余年前(以康熙五十九年为标准),“王船”均系木质造作而成,醮毕后相关人员送船入海、驾小船返回。约康熙五十九年前后,“王船”改为竹质、外糊彩纸,事后抬至水边焚烧。由此可见,“浮海”和“火化”这两种送瘟方式,清初就已在闽台二地开始流行。而今台湾地区王醮仪式则一律采用焚送王船“游天河”的方式,乃系日治时代地方政府干预和引导的结果。据当地耆老回忆:20世纪50年代以前,台湾本土王醮送瘟仪式还是以送船泛海的“游地河”形式为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闽台文献中谈到送瘟方式的选择,似乎还与王船质地有一些关联:采用“泛海”方式送走的“王船”一般系木质结构、彩绘而成,而那些竹扎、纸糊的“王船”则多被抬至海边“火化”。这是因为,竹纸“王船”不堪远航,没有抗击风浪的能力,也无法自行驶离出境,故择水边(海滩)焚烧之、以示送走^⑬。相对木船而言,此类王船的最大优势就是造价较低,可极大节省费用。今台湾地区常见之“王船”均系木质彩绘而成,制作精美、雕梁画栋,堪比真船,一把火烧成灰烬,令人惋惜。

此外,连横撰《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神教》记载:晚清台南民众每年六月“送王”时亦采用焚化纸糊舟船的方式:“岁以六月出巡,谓之逐疫。乔装鬼卒,呵殿前驱,金鼓喧阗,男

女杂沓，倾钱酬愿，状殊可怜。越二日以纸糊一舟，大二丈，奉各纸像置船中，凡百器用财贿兵械，均以纸绸为之，大小靡不具。愚民争投告牒，赍柴米，舁舟至海隅火之，谓之送王。七月七日，又至海隅迎之。”^⑤而今台湾的王船多系由木质打造，规格大小不一，漆金描画，舱门楼阁，诸班衙役（纸糊），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几与真船无差。

第四，所祀瘟王：五瘟帝与三瘟王

前引《榕城纪闻》、《乌石山志》谈到当地民众所供祀的瘟神为“五帝”——五位瘟神。乾隆年间所修《泉州府志》卷20《风俗·岁时》又称为“五方瘟神”，如云：“是月（五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设醮，至期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⑥

不过，前引康熙本《台湾县志》所言当地王醮“设瘟王三座”（纸质），即意味着彼时祭祀乃设三位瘟神。尔后，诸多历代志书（如乾隆六年《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乾隆十一年《重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五年《续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凤山县志》、道光九年《福建通志台湾府》）大抵承袭了此说法。尤其，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编纂《重修凤山县志》卷3《风土志·风俗》征引康熙本《台湾县志》上述内容后，又补充说：“民间斋醮祈福，大约不离古雉。近是，最慎重者曰王醮。先造一船曰王船，设王三位（或曰一温姓、一朱姓、一池姓），安置外方，迎至坛次。”^⑦这里谈到王醮需“设王三位”，并且点明了这三位王爷的身份——“或曰一温姓、一朱姓、一池姓”。温、朱、池姓三王，乃系闽台地区十分流行的王爷信仰。此外，乾隆十七年王必昌纂辑《重修台湾县志》卷6《祠宇志》^⑧和道光二十七年丁绍仪撰《东瀛识略》卷3《习尚》^⑨也分别印证了王醮祭祀时设纸糊瘟王像三座的说法。

而同样撰于康熙年间的《赤嵌笔谈》则谈到王醮期间民众供祀“五瘟神”，并且说这五人乃系出自三十六瘟神，遵奉上帝敕令巡游天下，三年一轮替。此外，《安平县杂记》“风俗现况”条介绍了当地白龙庵六月送船之情形，其中“每年由五瘟王爷择日开堂”之句点出了所供瘟神为“五瘟王爷”。另据连氏《台湾通史》卷22《宗

教志·神教》介绍了晚清台湾民众所祀“五帝”计分为两种情况：“而台湾所祀之五帝有二：其一为五显大帝，庙在台南郡治之宁南坊。……然台南所祀者，为像一，赤面三眼，则又别为一神，而为师巫所假借，故亦称为五显灵官也。其一为五福大帝，庙在镇署之右，为福州人所建，武营中尤崇奉之，似为五通矣。然其姓为张、为刘、为钟，为史、为赵，均公爵，称部堂，僭制若帝王。”^⑩

今天台湾民众或将“五府千岁”与此瘟神“五帝”混同。笔者田野调查时所见当地王醮科仪中多数设三瘟王——如苏厝长兴宫、西港庆安宫，少数庙宇则设五瘟王——如东港东隆宫每届醮科均从三十六位王爷中挑选出一名大千岁和四位千岁为“代天巡狩”，而苏厝真护宫则将庙内主祀的五府千岁视为王醮祭典之主角。

第五，是否设立王府？

明末海外散人撰《榕城纪闻》详细介绍了福州送瘟“出海”仪式中，民众专为瘟神五帝设立衙署、配置胥吏，五帝也一如人间的官僚大员，每日坐堂，批驳文书、处理公务。随员需按时奉进三餐，服侍更衣就寝。今台南及屏东等地设醮期间必为轮值王爷设置“王府”，并挑选若干民众充任差役和内侍，昼夜轮流执勤，规格仪礼一如《榕城纪闻》中所述。而翻检清代台湾文献中关于王醮仪式之论述，则无一涉及此类“王府”（衙署）的情况。那么，清代台湾民众举行王醮期间是否为瘟王设立“王府”官邸？历代文献中唯一可见端倪的是，前引《安平县杂记》“风俗现况”条介绍白龙庵送船之情形，其中云：“每年由五瘟王爷择日开堂，为万民进香。”据此推测，既然“五瘟王择日开堂”就意味着需为其预备坐堂办公的地点——“王府”。但是，在尚未寻觅到更有力的直接证据之前，我们暂时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清代台湾盛行的“王醮”仪式和福建沿海一带的“出海”习俗有着密切关系，二者可谓一脉相承，其源头甚至可追溯至古来的龙舟竞渡及“厉祭”传统。这种送瘟仪式乃系闽台地区所特有的，其间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沧桑而得以流传至今，尤为凸显出了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在文化传承中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通过对明清

文献中所涉闽台二地王醮资料的分析考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送瘟仪式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衍变,但其外在形式、科仪流程及核心内涵等方面都没有本质的改变。迄今,部分台湾民众仍遵循这一传统、恪守古礼,定期举办规模不等的王醮祭典(“送王船”)活动,大部分仪式步骤竟与明末《榕城纪闻》及清代闽台志书中记载惊人相似。而那些有着悠久设醮“送王”历史的庙宇——如台南县安定乡庆安宫和屏东县东港镇东隆宫就因传承有序且盛况空前而被学界坊间冠以“南东港、北西港”之美誉,甚至成为岛内民俗观光业的一大品牌,不仅拉动了当地经济,且振奋了民众精神、强化了社区团结、消弭了人际矛盾、缓解了贫富差距,由此成为一种独特的宗教社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内地沿海城市在中断数十年后重新恢复了“送王船”传统。2006年初,福建省政府批准将闽南“烧王船”习俗列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说明,王醮(“送王船”)这一古老的送瘟习俗在闽台大地上又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责任编辑:無邑)

- ①有关闽台地区王醮仪式的理论源头,笔者曾撰数篇论文予以探讨,详见拙作《“祀瘟神”与“送瘟船”——中国古代瘟疫醮之缘起》,(台湾)《汉学研究集刊》第11期(2010年12月);《“祠沙”、“放彩船”——闽台王醮仪式的源头之一》,《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传承与衍变——从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待刊。
- ②据《闽侯县志》记载,“海外散人”或为明末生员陈发曾。
- ③[清]海外散人撰:《榕城纪闻》,载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编》第二辑·第十四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133页。
- ④[清]郭柏苍、刘永松纂辑,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乌石山志》卷4,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
- ⑤[清]施鸿保:《闽杂记》卷7,来新夏校点,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 ⑥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卷15,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517页。

- ⑦吴增:《泉俗激刺篇》,载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泉州: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
- ⑧[清]周鍾瑄主修、陈梦林等编纂:《诸罗县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
- ⑨[清]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台湾县志》卷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此后历代志书对此段文字多有抄录和征引,如乾隆六年《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乾隆十一年《重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五年《续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凤山县志》、道光九年《福建通志台湾府》。
- ⑩[清]黄叔璥:《赤嵌笔谈》卷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台海使槎录》卷2。
- ⑪闽地送瘟设醮之情况,虽以每年例行者居多,然亦非全然如此。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海澄县志》卷15《风土》:“近滨海村民不识事理之辈,每二三年间倡为造王船之说,其百端耗费,穷极佻巧,动敛数百金。”([清]陈璆等修、邓廷祚等纂《海澄县志》卷15,《中国方志丛书·福建省》第9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5页)
- ⑫佚名:《安平县杂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
- ⑬[清]陈璆等修、邓廷祚等纂:《海澄县志》卷15,《中国方志丛书·福建省》第9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5页。
- ⑭不过,前引《安平县杂记》所言“白龙庵”纸制王船采用出海之方式,与常规标准不符,当系个案。
- ⑮连横:《台湾通史》卷22,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 ⑯[清]怀荫布修,黄任、郭麐武纂:《泉州府志》卷20,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492页。这段文字亦见于民国时人苏镜潭修纂《南安县志》卷8《风俗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38页。
- ⑰[清]王瑛曾编纂:《重修凤山县志》卷3,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
- ⑱[清]王必昌纂辑:《重修台湾县志》卷6,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13种。
- ⑲[清]丁绍仪:《东瀛识略》卷3,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种。
- ⑳连横:《台湾通史》卷22,第301页。